三秦印记

陕西人文的变与不变

□ 刘瑾

我于1985年出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韩城，一座因司马迁而熠熠生辉的古城。儿时的记忆里，滗水河静静流淌，文庙的飞檐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司马迁祠前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每逢清明，父亲总会带我去拜谒太史公祠，他站在碑前轻声念着《报任安书》中的句子："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一刻，我虽年幼，却隐约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文化分量，那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悄然注入我的生命。

2003年9月，我背上行囊，离开韩城，走进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门。那一年，西安的城墙依旧厚重，钟楼的光影在暮色中缓缓流转，而城市正悄然苏醒。校园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谈论着互联网、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片曾孕育周秦汉唐辉煌的土地，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文跃迁。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也深刻体会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区域文明演进的引擎。那时的我未曾想到，多年后我会以另一种身份，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参与书写它的新时代篇章。

2013年，欧洲留学三年又在北京工作三年后，我回到陕西，进入陕煤集团战略规划委，正式投身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彼时的陕西，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我有幸参与了多个陕煤重大产业布局与"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在一次次调研、论证与决策中，我不断回望脚下这片土地：从渭北高原的煤海深处到关中平原的麦浪翻滚，从秦岭深处的生态屏障到延安窑洞里的红色记忆，陕西的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历史的回响与未来的可能。

如今，我在陕煤集团下属企业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无论职务如何变化，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从韩城走出来的文化之子。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一本泛黄的《史记》影印本，那是父亲在我离家求学前亲手交给我的。每当决策陷入困境时，我总会翻开它，仿佛能听见太史公穿越千年的低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也正是这个"变"字，让我深切体会到三秦大地的人文之韵、传承之力、革新之势。四十多年一路走来，我见证了传承三千年的文化基因亘古不变，也亲历了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背景下，陕西人文的巨变。

经济发展加速了观念蜕变。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村里人常说："安土重迁，离乡背井是下策。"那时的陕西山村，炊烟袅袅，邻里相望，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重农轻商的观念根深蒂固。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进关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起行囊奔赴大城市、奔赴南方。我也在求学与工作的辗转中，逐渐感受到一种悄然发生的变化——人们开始谈论"机会""发展""自我价值"，法治意识和契约精神不再是课本里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影响生活选择的准则。

改革开放带来了印象转变。记得小时候，韩城的司马迁祠虽庄严肃穆，但展陈简陋、游客寥寥；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级文化地标，数字化展陈、沉浸式剧场、研学课程一应俱全，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前来"与太史公对话"。司马迁祠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庄重与肃穆，更融入了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活动。人们对陕西文化的认识，早已不再是停留在博物馆里的静态文物，而是可感、可触、可参与的生活体验。同时，在扩大开放的大环境下，陕西作为十三朝古都和古丝绸之路起点，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认可度、美誉度不断提升。我在旅欧留学期间，在一家博物馆观看了"长安与罗马"主题展览，该主题展展出了唐代长安城的复原模型与丝路贸易文物。一位德国学者对我说："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总绕不开西安。"那一刻，我心中涌起强烈的自豪感。

社会进步推动了觉醒质变。作为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我几次深入陕南、陕北乡村调研。我曾参与过一次乡村公益项目，看到昔日闭塞的村落里，竟有老人主动报名成为环保志愿者，守护家门口的小溪。今天的陕西农村，不仅通了水泥路、接了互联网，更建起了文化礼堂、乡村书院和非遗工坊。在延安安塞，老艺人教孩子们打腰鼓；在安康，农民画合作社通过电商平台把作品卖到了海外。从乡村到城市，从文化到生活，从传统到现代，一种由内而外的人文觉醒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生长。在西安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传统的综合市场通过"微更新、轻改造"的方式，既保留了西安人市井烟火气的"魂"，又注入了新的产业业态。咖啡馆、小吃店、书店与菜市场和谐共存，成为年轻人和游客的打卡地。这种更新模式，既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创新的觉醒，也避免了过度商业化，让老街坊和新邻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体现了城市治理中的人文关怀和创新思维。

媒体技术催生了文化裂变。再去陕西历史博物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能隔着玻璃看文物的地方——它的"云上博物馆"项目让全球观众足不出户即可漫观大唐珍宝，AI导览、AR复原技术让千年文物"活"了起来。我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曾通过平板电脑，亲眼看见兵马俑在屏幕上列阵行进，那一刻，他惊叹："妈妈，历史真的会动！"而"云游陕西"的播放场景更是让我震撼：当镜头缓缓掠过大唐不夜城的灯火长廊时，屏幕上的实时弹幕如星河般闪动。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表达，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全民共创的盛宴。漫步在大唐不夜城，灯火如昼，满街的游客穿着汉唐服饰，街头艺人用电子鼓点演绎陕北说书——传统与现代在此交融，内敛与开放在此共生。这不仅是城市的更新，更是精神气质的重塑。

回望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陕西的人文之变，始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兴于教育普及的深化，成于文化交流的广阔，最终落脚于每一个普通人精神世界的丰盈。而我，一个从滗水河畔走出的孩子，有幸亲历这场巨变，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陕西人文的巨变，变的是传播方式，是创新活力，是与时俱进；不变的是传统美德，是灵魂与根基，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多元包容的不变，体现了陕西黄土的厚德载物。当我一次次行走于陕南、关中与陕北之间时，才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在汉中的雨巷深处，我听一位老茶客用带着川音的陕南话讲起"湖广填陕西"的往事。他的祖辈来自湖北，带来了徽派建筑的技艺，于是青砖黛瓦、马头墙影便在这秦巴山地间悄然落脚。我在安康的老宅天井下驻足良久，看阳光斜照进院落，南来的风与北地的寒在此交汇——那不仅是建筑的融合，更是血脉与记忆的交融。腊肉的浓香从灶台飘来，米皮滑嫩爽口，这一桌"南味北形"的家常饭，吃出的是移民世代的生存智慧，也是文化适应的温柔力量。我曾采访一位研究民俗的学者，他笑着给我讲"关中八大怪"：面条像裤带，锅盔赛锅盖……起初只觉夸张和幽默，后来才明白，每一"怪"背后，都是先民与自然博弈的生存哲学。那一晚，我住在渭南的农家小院，仰望星空，忽然懂了什么叫"厚土载物"。回望这些年走过的路，我才真正明白：陕西的多元文化，不只是历史的馈赠，更是地理、移民与时代共同书写出来的。

民间艺术的传承，体现了三秦人民的集体智慧。在华阴的戏台前，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秦腔的震撼——那位老艺人一声高吼，声震旷野，仿佛黄土高原的风都在应和。我曾亲临渭北的社火现场。鼓槌起落如雷霆万钧，百人齐奏，声浪翻滚，仿佛要把整个冬天唤醒。那一刻，我站在人群之中，心跳与鼓点同频，热血沸腾。这不是表演，而是一种生命的呐喊，是黄土地上最原始、最磅礴的文化脉动。最难忘的是在陕北的冬夜，我被邀请随一支民间艺术团深入延川的山村。寒风呼啸，窑洞外雪落无声，可一进屋，信天游的歌声就如烈酒般点燃了整个夜晚，高亢而苍凉，唱出了黄土高原的孤寂与深情。西安鼓乐，源自唐代宫廷雅乐的千年绝响，穿越历史长河，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严谨缜密的工尺谱记谱体系与庄重有序的演奏规制，堪称"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09年，西安鼓乐荣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仅彰显了其卓越的文化价值，更标志着它在世界文化谱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不仅如此，陕西拥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达89项之多，涵盖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技艺、医药、民俗等多个门类，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底蕴之深，构筑起全国最为密集、最具代表性的非遗集群之一。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岁月沉淀的历史记忆，更在当代社会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剪纸艺术早已突破传统窗花的局限，融入现代审美，演变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广泛应用于设计、装饰与旅游产业；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与校园传承推广，正悄然走进年轻一代的视野，激起情感共鸣；而诸如社火、庙会等传统节庆活动，在政府扶持与民间自发组织的双重推动下，已升华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文化品牌，成为连接城乡、凝聚乡愁的重要纽带。

文化自信的不变，是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每次我在飞机上，俯瞰秦岭的山脊，望着南北两侧截然不同的风景，仿佛置身于一条横贯中华文明的时空轴线。我常常思索，我为之骄傲的是，脚下的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竟是我生长的地方——陕西，一个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经历了十三朝辉煌的土地，又在新时代洪流中不断蜕变的美丽家园，我能不自豪吗？回望来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所彰显的文化价值，远不止于其深厚的历史纵深，更在于其文明的系统性、多样性与绵延不绝的传承力。从史前仰韶文化的彩陶遗韵到周秦汉唐帝都的巍峨遗迹，从地理过渡带孕育的文化交融到历代移民带来的多层文化叠加，从恢宏壮丽的物质文化遗产到鲜活生动的民俗实践，陕西以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文化结构，完整勾勒出中华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脉络。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奔涌而至的今天，陕西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基因，依然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着丰沛的资源与不竭的灵感。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块秦砖汉瓦，每一句高亢激越的秦腔唱腔，每一道蕴含乡愁的关中风味，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古老文明何以历经风雨而始终生生不息的深层密码。

从秦岭南北的气候分界到方言饮食的交融共生，从古老戏曲的现代重生到数字技术激活的文化自信，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人文精神的重塑，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亿万普通人日常选择的累积，是每一代人对传统的守护与再创造。变与不变之间，折射出的是陕西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它不仅是五千年历史的忠实见证者，更是中华文化的坚定传承者，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凝聚之地。而我作为一个亲历者、记录者，也正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静水流深的变革。因为我深知，这片土地的温度，不仅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里，更流淌在每一个陕西人的眼神与言语中——那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序章。

未来，我将继续以文化为魂、以创新为翼，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守护好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根脉，让三秦大地的人文之光，在新时代的星空下愈加璀璨。我相信，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陕西必将在赓续文脉、涵养人文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以更加自信、开放、创新的姿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独特而持久的文化动能。

（作者系省政协委员，陕煤集团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史海钩沉

王莽村往事

□ 严维佳

王莽村不大，可名气不小，故事也不少。

二千年间，这个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仅有不足800户人家的普通村子（分东、西两个自然村，文中所指为西王莽村），据传因当年王莽追杀刘秀在此驻足而得名。出于对大名鼎鼎的新朝始皇帝王莽的好奇，今年三月末的一天，我第一次从西安出发，沿G5包茂高速南行20公里，出王莽互通立交向东，上S107省道前行约8公里，到了位于秦岭北麓、浅山与平原交会处的西安市长安区王莽街道（西王莽村）所在地。

开春时节，王莽村周边麦苗青青，桃红柳绿，村貌整洁，百姓安居，一派诗意田园。

在王莽街道文化广场上，矗立着一排文化墙，墙上的彩色连环绘画，讲述了王莽村得名的传说故事：相传，此地古时为皇家御园之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豪强割据。5年，王莽在长安称帝，定国号为新，后因听信妖言谶语，恐刘秀恢复汉室江山，即下令追杀刘秀。

一日，刘秀和随从出长安，逃至此地时，汗流浃背，饥渴难耐，看见路边有一口水井，正欲歇息喝水之时，忽见远处尘土飞扬，人喊马嘶，知王莽追兵将至，随从迅即将刘秀藏于井中，可井口一眼能见底，刘秀吓得直哆嗦。此时，忽见几只硕大的蜘蛛爬到井口，刘秀忙说："蜘蛛呀，你就不会学蚕吐丝，把井口网住，救救我吗？"蜘蛛们一听，便吐丝、结网、罩住了井口。王莽追兵来到井边，看到蜘蛛网未破，井内焉能有人，刘秀才得以幸免。

时至傍晚，王莽追兵绕了几圈，未见刘秀踪迹，便在此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村里鸡叫之时再开始追捕。刘秀爬出水井，筋疲力竭地逃到几里外的一个小村（即今长安区刘秀村）过夜，准备待明日鸡叫动身。

可说来神奇，王莽村在西，刘秀村在东，两村相距不到二里地。可第二天，刘秀村的鸡不到三更就叫了，刘秀闻鸡而起，仓皇逃命。而王莽村的鸡直到天亮才叫了几声，等王莽追兵起身追赶，刘秀早已一路东奔、逃之夭夭。

途中，刘秀和随从三转两转，来到今天的终南山脚下，时至正午，刘秀嗓子冒烟，偶见不远处有一处桃园，鲜桃正熟，随即摘下几个，可还未吃完，又闻王莽追兵将至，顿时惊慌失措。可随从却从容答道："主公不必担心，桃即逃也，主公必能摆脱追兵。"刘秀果真逃脱。成就大业后，他将在终南山下吃过的水蜜桃作为贡品，美誉流传至今……

王莽追刘秀的故事也许只是个传说，但如今的长安区王莽村和刘秀村却是真实存在的。时隔数月，又是水蜜桃正熟的七月天，我再次驱车来到距王莽村不远的刘秀村，这里与王莽村一样，也是山清水秀、绿荫环抱的好地方。只是两个以王莽、刘秀命名的村子里，早已难觅二千年前王莽追刘秀时的任何"蛛丝马迹"。

那么，时隔整整二千年，当年王莽追刘秀的故事真实发生过吗？两人曾有过谋面吗？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反复萦绕，难以释怀。

为此，我近来通读了新锐文史作家张向荣先生所著《王莽和他的时代》一书，并参考班固《汉书·王莽传》和黄留蛛所著《刘秀传》等相关资料，试图寻找这二千年未解的答案。

王莽（前45年–23年），魏郡元城（今河北邯郸）人，新朝唯一皇帝，在位十五年（8年–23年），改革家、政治家。刘秀（前5年–57年），南阳郡蔡阳（今湖北枣阳）人，东汉开国皇帝，在位三十二年（25年–57年），政治家、军事家。史料称，原来两人并无血缘，唯一关系是："刘秀称帝后，追认汉元帝刘奭为父。"而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又是王莽的姑姑，这样一来，两人在宗法上成了"表兄弟"，但政治上却是"死对头"。

其实，刘秀的生父是南顿（今河南项城）县令刘钦。刘秀年仅9岁时，其父在县令任上去世，他与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依，被叔父刘良收养，成了普通农民。热衷务农的刘秀，对种地这活儿一干就是十年，直到19岁，依然在南阳郡春陵白水乡勤勤恳恳地务农哩。

而此时，正是王莽建立新朝的第六年。已经59岁的王莽（比刘秀大近40岁），可谓新朝初定、踌躇满志，正在长安城大张旗鼓地推进改革：设王田、禁奴婢、搞六莞、改钱币。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地安抚刘氏宗亲，根本不知南阳务农的刘秀为何方神圣。

可到了公元14年–19年间，叔父刘良为他前途计，决定送刘秀到长安城，入太学学习，随名儒许子威后，略通大义。在此五年中，作为刘氏没落宗亲，刘秀才第一次进长安城，大概率是见不到日理万机的新朝皇帝王莽的。不过，也许他在长安见识过，王莽出行时的大阵仗、名场面，《后汉书·皇后纪》所载，刘秀为此曾发出"仕宦当作执金吾（京城治安负责人），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慨。

而刘秀第二次再入长安，原因则更为滑稽，竟是帮人到长安城打官司。刘秀回到故乡春陵后，开始用在长安学到的知识，观察、体悟时局。他沉稳的性格和在长安游学的经历，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刘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恰逢刘敞因地租纠纷要打官司，便委托这位踏实能干、熟悉长安且无造反之心的侄子，到长安帮他打官司。

刘秀重返长安，办事之余还结识了时任大司马严尤，并给其留下了"美须眉，长得帅，人实在"的印象。言谈中，刘秀虽感到了王莽新朝所面临的潜在危机与外在危险，但还不足以达到兴汉反莽的地步，王莽也不可能追杀这位来长安打官司且寂寂无名的"小字辈"。

新朝地皇二年（21年），王莽最大的外患是日益兴起的叛乱与民变，以绿林、赤眉和被绿林兵拥立的更始皇帝刘玄（曾称汉更始将军），才是王莽的心腹大患。此时27岁的刘秀，刚因表兄刘縯被刘玄拜为大司徒，自己带领由宗亲组成的春陵军加入更始汉军，第一次被封为太常偏将军。虽是"带资进组"，却连一匹战马坐骑都没有，战时骑牛上阵，平时还干些倒卖粮食的活儿，根本算不上反莽大军中的"主角儿"。使刘秀一战成名的是昆阳（今河南叶县）之战。刘秀以"合兵尚能取胜，分散势难保全"为由，固守只有2万守军的昆阳，并亲率千余精锐出城求援，偷袭王莽军大营，令号称42万大军的莽军一败涂地，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如果说王莽在这场关乎新朝国运的昆阳之战中能御驾亲征，没准能和刘秀在两军对阵中见上一面。可王莽此战派出的是大司空王邑和大司徒王寻，昆阳惨败，令新朝大势已去，刘秀一战封神。公元23年长安城破，更始汉军攻上渐台，王莽身首异处。公元25年，31岁的刘秀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千秋亭即皇帝位，称汉世祖光武皇帝，定都洛阳，为东汉大业奠定了基础。

至此，二千年前，王莽和刘秀一对"表兄弟"、两个"死对头"，已再无谋面的可能。至今，史学界无数争论和坊间传说故事，虽众说纷纭，但两个由此得名的小村子，两千年来却在长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如今，徜徉在王莽村的街头巷尾，阅读着王莽村的前世今生，脚下踩着的，是二千年亘古未变的古老土地；心中思索的，是二千年神奇传说的历史真相。

文史馆的故事

一幅"博爱"题词背后的百年回响

□ 任强

走进省政协文史馆，每逢在展柜前驻足，我总要在那幅尺幅不大的书法作品前多看几眼。上书"博爱"二字，落款"孙文"，钤印一方。墨色沉着，笔势开张，仿佛一位故人隔着百年光阴，仍在无声地诉说。

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赠陕西革命志士高又明的墨宝。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陕西响应。同月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在西安成立，高又明受任掌械官。彼时军械奇缺、弹药无着，他凭借早年研究炸药之学，带领工匠因陋就简，自制地雷、炸弹，源源不断输往东西两路战场。以一己之力，开创陕西革命军自造军火之先河，被时人誉为"陕西革命军中制造军火的首倡者"。孙中山先生闻其功绩，欣然命笔，书"博爱"二字以赠。

孙中山先生一生以"博爱"为旗帜。他奔走革命，"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所求无非"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他理想之极境，而"博爱"二字，正是此一理想最凝练、最温暖的表达。

高又明得此赠书，非仅一人之荣。他早年经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为陕西最早之革命党人，虽僻处西北，却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方略。在军政府、在靖国军、在兵工实业之间，他以实干践行理想——辛亥年间，为百姓挣脱封建枷锁而战；靖国军时，掌军械、办制造，以护一方安宁；"九一八"后，又办工厂、兴实业，冀使同胞少受外货盘剥，能自食其力、安身立命。他的一生，始终未离"为民"二字。孙中山先生"博爱"之赠，实是对一个群体、一种精神的深切期许。

百年弹指，墨迹如新。这幅题词早已超越私人酬赠的范畴，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南北志士同气相求、共赴国难的见证。它所承载的，是一代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是变革洪流中那份始终不曾冷却的赤诚。

作为文史工作者，我常想，政协文史工作"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使命，在这样一件文物面前显得格外具体。历史不是遥远的回响，它就凝结在一笔一画之间。我们将其妥为保存、郑重讲述，不只是为了追怀过去，更是为了把"博爱"的精神火种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让后来者从这短短二字中，读懂一个时代的理想与选择，也读懂我们今天前行的来路与方向。